

区域国别学中的社会学:历史脉络与学科交融

朱 颖

[内容摘要] 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的需要、时代的要求。本文探讨了区域国别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其一,从社会理论的演进与知识谱系中,厘清区域国别研究在社会学传统中的历史地位与方法论基础;其二,分析社会工作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交叉领域,提出“共生性互构”的知识范式与实践路径;其三,探讨社会学视野和方法进入并重塑区域国别研究的数据基础与分析逻辑,辨析社会学不同分支在区域比较与治理研究中的价值与挑战;其四,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阐释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化、本土化路径,强调“文化互鉴”“多元共生”理念的知识建构意义。本文通过以上多维度的探讨,旨在为区域国别学与社会学的深度整合提供系统性梳理与学科建设的方向指引。

[关键词] 社会学 区域国别学 社会工作研究 计算社会科学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 朱颖,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编辑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4-0131-24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国别学作为理解世界格局演变和多元社会结构的关键学科,其与社会学的交汇不仅体现为研究对象的重叠,更体现在理论架构与方法论路径的深度融合。本文立足于“区域国别学中的社会学”这一主题,试图在理论梳理与实践观察之间搭建桥梁,来探讨社会学如何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多维视角与批判工具,同时揭示区域国别学如何在知识基础、文化底色和研究范式的层面上反哺社会学。

本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回顾了区域国别学在社会学理论中的

思想沿革,勾勒出其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历史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谱系与范式变迁。第二部分转向实践场域,聚焦社会工作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在跨文化服务、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深度耦合,强调两者的“共生性互构”。第三部分聚焦社会学的五个分支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和融合,分析社会学想象力和研究方法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优势与发展。第四部分则从中国社会出发,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双向互动,强调“文明互鉴”“文化多样性”等理念对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最后反思当前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社会学转向的回应,并展望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的未来走向。通过以上多维度的理论探讨与经验分析,本文旨在呈现区域国别学与社会学交汇过程中所释放的洞见、空间与解释力,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知识生产、文明互鉴与制度创新提供跨学科的思考框架。

一、社会理论与区域国别学:历史、传统与挑战

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古典社会学发展至今,相关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地区和社会的风貌,而且开创并延续着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其中一些更是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参照,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现实影响。

在古典社会学中,尽管孔德与斯宾塞并未明确指出他们的讨论范围,但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这种思路并不罕见,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便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推导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他并没有将《资本论》所揭示出来的经济规律的当代价值局限在英国。稍晚一些,马克斯·韦伯完成了古典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国别研究,他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大型文集原本计划只讨论若干重要宗教(如基督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古犹太教等)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并非仅限于宗教。例如,韦伯从整体考察了古代中国与印度的方方面面,涉及国家历史沿革、政治制度设计、经济发展、伦理精神等议题,充分展现了这两

个国家的整体状况。^①

涂尔干的研究与孔德相同,都是将法国作为分析对象。在受到涂尔干深刻影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中,区域和国别研究大量出现。例如,马林诺夫斯基针对特洛布里恩群岛为中心的库拉区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当地土著社会巫术、宗教、贸易、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②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详细描绘了安达曼岛人的社会组织、仪式习俗、宗教和巫术信仰。^③在此基础上,英国社会人类学有关区域和国家的相关研究极其丰富,例如,埃文思-普里查德与福蒂斯对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各王国政治体系的分析;^④埃德蒙·利奇针对缅甸北部山区的社群、文化和仪式的研究。^⑤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巨大影响不仅限于英国本土,对美国和中国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玛格丽特·米德在英国人类学的影响下,通过对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青少年的考察,指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乃是人类所共有的;^⑥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下完成了传世名作《江村经济》,深刻剖析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农村经济形态及其与社会地理环境和社区权力结构的关系,是功能主义人类学传统与中国社会结合建构的作品,该书不仅重建了变动时代的中国乡村面貌,更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学真正的起点。^⑦

在现代社会学中,两个重要的传统产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成果。第一,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别是在该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出现了大量有关现代化转型的著作,例如,罗伯特·贝拉聚焦德川时代日本民间不同宗教活动及其影响,继而从社会学与历史学角度对这

①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德] 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印度的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弓秀英译:《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③ [英]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梁粤译:《安达曼岛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英] M. 福蒂斯、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刘真译:《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⑤ [英] 埃德蒙·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⑥ [美] 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译:《萨摩亚的成年人: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⑦ 费孝通:《江村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版。

一时期日本的社会、宗教、历史与文化进行交叉研究和探索;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使用比较政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对东南亚、东亚、次撒哈拉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发展历史、进程、结构和功能进行比较,聚焦政治发展的不同模式和进路。^① 上述作品深入分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宗教、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转型,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成果。

然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西方中心论、分析较为静态和僵化等。在批判这套理论的基础上,20 世纪下半叶,社会学兴起了另一个关注国别与地区发展的研究传统,即历史社会学或历史社会科学,其核心关注是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 仍然受到现代化理论影响而带有决定论倾向,但已经开始重视社会变迁与断裂分析的阶段,以巴林顿·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为代表,这部作品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亚洲各国的革命,指出西式民主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是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②(2) 偏重物质性和结构性因素的新韦伯主义阶段,以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为代表,前者分析了国家政权在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③后者则探究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机制;^④(3) 偏重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和偶然性因素,代表如石桥的《魔鬼的笔迹》和菲利普·戈尔斯基的《规训革命》,前者讨论了德国的三个殖民地,即中国青岛、萨摩亚和非洲西南地区,重点关注殖民统治的文化渗透与心理塑形,后者处理的是宗教在欧洲低地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⑤

① [美]罗伯特·贝拉著,王小山、戴茸译:《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詹姆斯·科尔曼等著,任晓晋、储建国、宋腊梅译,《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苗、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⑤ George Steinmetz, *The Devil's Hand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美]菲利普·戈尔斯基著,李钧鹏、李腾译:《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在当代社会学中,地区和国别研究仍然是社会学的关注重点。然而,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学家对这种研究思路的反思。一方面,聚焦于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同侧面。以经济为例,古典社会学延续了德国历史学派关注现实经济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国的经济发展就始终处在社会学家的关注范围内,如傅高义对日本社会发展模式独特经验的研究;高柏对1931年至1965年期间日本的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与经济意识形态关系的深度研究;弗兰克·道宾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铁路产业史的案例比较研究;彼得·埃文斯通过对韩国、印度和巴西发展经验的比较,提出“嵌入性自主”作为描述国家与社会、市场互动关系的新概念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新经济社会学的标志性文集《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中,国别和区域同样是重点关注对象。^①事实上,当代社会学家的切入点不只是经济,还包括文化、政治、科学等各个方面。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如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迈克尔·拉蒙跨越美法两国四地,系统、深入访谈数十种重要职业的近200位对象,深刻揭示法、美两国中产阶级的集体画像以及他们的金钱观、道德观和文化观;安德烈亚斯·威默基于若干国际主流数据库构建了一个新的关于民族国家形成和战争爆发原因的数据库,并通过对该世界冲突数据库进行量化历史分析,展开了对民族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精彩论述等。^②

但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很早便开始反思地区和国别研究若干成问题的假设,尝试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突破所谓的“方法论国别主义”或方法论地区主义,即默认国家或地区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做法。

第一,从现实经验的角度讲,国家的边界往往并不是清晰可见的,维持国家边境线稳固和清晰的能力实际上是少数实力强大的国家的“特权”。无论地区还是国家,边界都并非绝对不允许跨越;相反,边界往往也是文化和政治交流的渠

① [美]傅高义著,谷英、张柯、丹柳译:《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美]高柏著,安佳译:《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弗兰克·道宾著,张网成、张海东译:《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彼得·埃文斯著,朱天飏、周雪莲译:《嵌入式自主性与工业进步》,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瞿铁鹏、姜志辉译:《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 [美]迈克尔·拉蒙著,谢天、珍栎译:《金钱、道德和做派: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美]安德烈亚斯·威默著,杨端程译:《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道,这就导致国别和地区研究必须考虑扩展或淡化边界的问题。例如,埃里克·塔利亚科佐便延续了布罗代尔等人的看法,指出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交流和重叠。^① 迈克尔·曼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分别以不同的方法超越了国别主义或地区主义,前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物理边界无法构成充分的分析标准,更好的分析对象是四种权力及其所构成的网络,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②后者则构建了更加宏大的体系,将国家和地区都纳入世界体系之中,认为只有从全球秩序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和国内状况的特殊性。^③

第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国家或地区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单位,实际上只是不加反思地投射了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将每个国家地位平等且都应当受到尊重的这一规范性认知认为是事实性状态,即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和当代全球社会中都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例如,丹尼尔·彻尼罗等人便认为,在研究国家的历史时,“国家等于社会”的方法论国别主义设定必须被超越,否则不仅有碍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更会使我们丧失探索未来政治发展可能性的社会学想象力。^④ 在此背景下,我们能看到乌尔里希·贝克和约翰·迈耶对现代社会国别分化的深入反思,前者倡导全球社会,认为这是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途径,后者则推广世界社会的概念,指出尽管社会分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并未停止,但也存在着世界范围内制度和文化的同构。^⑤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学是西欧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思想产物,在一个已经确立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格局中,社会学家一开始就默认了国家作

① [美]埃里克·塔利亚科佐著,闫佳译:《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 年版。

② [美]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从开端到 1760 年的权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夏继果、顾宁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Daniel Chernilo, "Social Theory's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9, No. 1, 2006, pp. 5 ~ 22.

⑤ 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No. 1, 2000, pp. 79 ~ 105; John W. Meyer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3, No. 1, 1997, pp. 144 ~ 181.

为分析单位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作品,其风格多样,例如,按照方法可区分开比较与个案,按照主题可区分开侧面与整体,按照视角划分为宏观的和微观的,按照研究取向可区分为静态的(结构与功能)与动态的(过程和历史)。但在不断回应现实变化和需求以及探索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学家也始终关注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并探索超越这一范式的办法。

二、区域国别学与社会工作研究:实践、方法与定位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进行知识性探索的重要形式。^①传统区域国别研究深受欧美殖民思维影响,构建了“中心—边缘”的不对等体系;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正逐步实现四个转向:从“西方中心”迈向“多元共生”,推动多元文明对话;从“单一学科”走向“跨学科融合”,建立综合性研究范式;从“学术孤立”转向“服务实践”,强调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结合;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治理”,关注全球性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社会工作作为同时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张力的领域,其知识体系正经历从“模式移植”到“本土探索”再到“全球协作”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型要求社会工作研究者具备“全球—本土联结”的视角:一方面,由于跨国移民、资本流动与气候危机等问题的跨境特征,社会工作研究无法局限于地理边界内;另一方面,流动性社会中服务对象的需求日益多元,迫切需要整合多国政策经验与社会资源,^②因此,社会工作研究天然具有跨国别视域。

现实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工作研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交叉趋势,两者的结合催生出“跨国社会工作”与“比较社会工作”等新兴研究方向。从研究的互补性来看,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为社会工作研究提供“文化深描、政策比较、历史语境”三重支持,而社会工作则可为区域国别研究注入“实践介入、服务创新、伦理

① 任晓:《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4期,第3~16页。

② Karen Lyon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m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36, No. 3, 2006, pp. 365 ~ 380.

反思”的行动取向。二者的融合不仅有助于克服社会工作研究中“专业主义”的局限,也显著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关照能力,尤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加剧的当下,其意义尤为突出。但目前的关注和聚焦都相对不足,由此,本文提出“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希冀推进两者的进一步交叉、互动和融合。

(一) 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跨国社会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全球化进程加速了社会问题的跨国传播,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社会工作理论逐渐显露其局限性。跨境人口流动、资本全球化及技术变革等因素为跨国社会工作研究带来三大核心挑战:^①第一,空间重构:跨境家庭成员分散于多个国家,导致代际支持链断裂与子女教育中断。例如,欧盟内部因《都柏林公约》所引发的难民家庭分离问题,凸显出传统社会工作理论在以“国家边界”作为服务供给单位时所面临的困境。第二,权力解构:国际移民政策与跨国资本流动形成结构性压迫。例如,欧盟的移民配额制度通过“责任分担”机制将难民接收成本转嫁至边缘国家,进一步加剧了难民在就业与医疗等领域的边缘化。^②第三,伦理张力:文化相对主义与全球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成为核心议题。例如,将“个体自主”作为儿童保护的唯一标准,在某些集体主义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对家庭结构的破坏。

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愈加复杂的社会问题,理查德·哈格曼等提出了“无边界社会工作”的概念,主张通过跨国合作网络实现资源、知识与经验的共享。该概念可从三个维度加以理解:

第一,流动性主体视角:社会工作者需关注生活在多国边界之间的服务对象独特需求。例如,比利时境内的土耳其裔移民依赖两国的资源网络重构社会资本,其子女既需接受比利时的语言教育,也需接受土耳其的宗教教育传统。^③

① Rich Furman, Nalini Junko Negi and Rommel “Bombie” Salvador,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in Nalini Junko Negi and Rich Furman,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 ~ 19.

② Erica Righard, “Conceptualising Social Work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nationalism,” *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 Vol. 8, No. 4, 2018, pp. 245 ~ 253.

③ Sophie Withaecx, Mieke Schrooten and Dirk Geldof, “Thinking and Acting Globally and Locally: Developing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s in Belgium,”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Vol. 7, No. 2, 2017, pp. 143 ~ 157.

第二,制度嵌套分析:社会工作实践应嵌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语境的交叉场域。例如,欧盟“SOLIDAR”项目通过多国联合调研,识别跨境家庭在医疗报销、教育衔接等方面的共性需求,建立跨国社会工作者网络共享资源包。^①

第三,文化多元化:社会工作需顺应服务对象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现实。例如,北欧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布的《跨国实践宣言》明确禁止将单一文化模式作为服务标准,强调文化敏感性、政策协同性与技术适配性。^②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在于打破国家边界对服务供给的制约。区域国别研究应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通过跨国比较揭示社会工作实践的多样性与共通性。^③ 例如,北欧福利国家强调国家责任,美国则更依赖市场机制,这些差异可为资源配置与服务效率的优化提供启示。这种比较并非旨在构建“最佳实践”模板,而是通过“模式对比”与“经验迁移”推动理论深化。

(二) 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转向:从“知他”到“共情”的认知跃迁

传统区域国别研究路径常陷入“自我中心主义”陷阱,表现为对他者文化的单向凝视与知识殖民倾向。例如在社会工作教育中普遍存在“知识殖民”现象,即将西方理论直接套在非西方语境中,忽视本土实践智慧,最终导致文化误读与服务脱节。^④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保护网络”项目中,国际组织主导的标准化培训将“体罚”直接归类为“虐待”,却忽视当地社区将适度体罚视为“纪律教育”的文化传统,致使项目推行受阻。

为破解上述困境,学者们指出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应实现两个层面的范式转向:

① Isidor Wallimann,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with Perspectives,” in Carolyn Noble et al., eds., *Global Social Work: Crossing Borders, Blurring Boundar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5 ~ 26.

② Erica Righard, “Conceptualising Social Work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nationalism,” *Nordic Journal of Migration Research*, Vol. 8, No. 4, 2018, pp. 245 ~ 253.

③ Mieke Schrooten, “Bringing the Transnational into Social Work,” in Margit Fauser and Xóchitl Bada,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p. 143 ~ 154.

④ Valerie Ouedraogo and Barbara Wedler, “Westernization-indigenisation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Understanding Indigen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in Jan Erik Henriksen et al., eds., *Recognition, Reconciliation and Restoration: Applying a Postcolonial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Work and Healing Processes*, Orkana Akademisk, 2019, pp. 181 ~ 200.

第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自我中心主义”到“双向认同”。莱昂斯与梅-查哈尔主张以本土价值体系为研究起点,社会工作者需具备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与尊重,从“俯视他者”转向“平视对话”,在全球社会正义与地方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均衡,承认本土实践智慧的知识合法性。^①

第二,知识生产的转向:“技术移植”到“批判性本土化”。批判性本土化强调在保留西方理论核心原则(如社会正义、人权)的基础上,通过文化转译对实践工具进行重构。例如,比利时社会工作者将阿拉伯语调解机制纳入家庭暴力干预流程,既遵循“对暴力零容忍”的西方原则,又通过文化中介缓解穆斯林社区对“告发”行为的抵触。非洲国家将传统社区会议融入社会工作流程,在通用伦理框架下实现工具的本土化重构。^②

从历史上看,社会学的兴起伴随着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扩张,其发展历史也是不断挣脱“自我中心主义”束缚的过程。早期社会学理论多基于西方社会的自我观察,所形成的理论预设被视为普世规范。而区域国别研究,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与康奈尔的《南方理论》,正是在对“落后”文明的研究中导致在范式层次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从而反哺社会学。这种理论层面的跨学科对话,使社会工作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实现了相互滋养。

(三)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重点:关系性视角与情境化服务的共生性创新

在关系性视角方面,“双向认同”与“跨文化对话”成为关键路径。伊西多·瓦利曼对德国“融合课程”与加拿大“定居服务”的比较研究显示:德国模式通过标准化语言与职业技能培训规训移民,将其视为需改造的“他者”;而加拿大则通过构建社区网络提升移民的社会资本,赋予移民重构就业路径的社区支持。^③这反映了日耳曼文化对秩序的偏好与英美文化对个体能动性的重视。加拿大模式

① Karen Lyons and Corinne May-Chahal, “Glocal Social 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20, No. 1, 2017, pp. 1 ~ 4.

② Stefan Köngeter, “Paradoxes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Social Work,” in Adrienne S. Chambon et al.,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Support*,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87 ~ 210.

③ Isidor Wallimann,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with Perspectives,” in Carolyn Noble et al., eds., *Global Social Work: Crossing Borders, Blurring Boundar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5 ~ 26.

通过文化对话消解了规训逻辑,使移民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瑞士的“文化中介”项目进一步深化了关系性实践。项目的社会工作者与土耳其社区领袖协作,将“社区参与式需求评估”嵌入难民服务流程,将“专家定义问题”转向“本土经验生成知识”,消解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力边界,将文化差异转化为服务创新的资源,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共生共建。^①

在情境化服务层面,“文化转译”与“动态适配”是核心策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保护网络”项目通过叙事转译推动制度衔接:将西方儿童权利标准分解为“免受伤害”“发展潜能”等核心要素,并借助非洲民间故事与谚语重构传播方式。面对“体罚”问题,不予直接否定,而是引导社区通过双语材料讨论“何种管教方式更符合儿童最佳利益”,在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之间建立共识。^②

这些实践共同构建了一个“共生性知识体系”:既非盲目套用西方理论,也非固守本土传统,而是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知识的动态生成。关系性视角通过权力重构与主体性赋予激发文化差异的创新潜能;情境化服务通过文化转译与本土化改造弥合全球经验与本土实践之间的裂隙。二者协同推进社会工作从“自我中心主义”走向“共生共建”,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操作的跨文化实践范式。

三、区域国别学中的社会学方法:机遇与融合

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来源于直接的实践诉求,以理解某种作为“他者”的文明体为目标,其研究方法以“远观”“统揽”为特色。受限于学科发展史和方法库,这种研究无法充分发挥在实证研究、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等方面的潜力。相比之下,社会学在各个子学科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积累了相对成熟的概念体

① Adrienne Chambon and Stefan Köngeter,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in Social Work-Variations, Innovations, and Researchers’ Locations,” *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Vol. 2, No. 1, 2012, pp. 7 ~ 9.

② Valerie Ouedraogo and Barbara Wedler, “Westernization-indigenisation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Understanding Indigen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in Jan Erik Henriksen et al., eds., *Recognition, Reconciliation and Restoration: Applying a Postcolonial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Work and Healing Processes*, Orkana Akademisk, 2019, pp. 181 ~ 200.

系、基本方法 and 研究范式。将社会学方法应用到区域国别学中,将使区域国别学获得“深读”“细描”的能力。本节就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政治社会学、计算社会学等维度进行简要讨论。

(一) 历史社会学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社会学关注社会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研究社会结构如何生成、演变,并塑造重大历史事件,其目标在于揭示历史性转变背后的因果机制。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在考察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机制时面临两个困难:其一,可供研究的案例非常少;其二,需要纳入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在这种局面下,我们需要诉诸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以建立对社会变迁的因果机制理解。^①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我们频繁地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抓手,通过探寻社会变迁的因果机制来理解一个文明体的历史和现状。以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形成的研究为例,蒂利以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等国的建政史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国家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互动的因果解释。他发现,近代欧洲国家是在战争、税收与资本积累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国家不是通过理性设计构建,而是在长期对抗和资源动员中塑造出来的,地方贵族、资本家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冲突、协商、强制和妥协塑造了国家能力与疆域,也即“战争造就国家,国家造就战争。”^②虽然蒂利的研究对象是近代欧洲国家,他的视角、方法和结论对于理解其他国家的建政史也颇具启发价值。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经典研究是弗雷德里克·库珀对非洲殖民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分析。他批评了将国家视为既定实体的观点,强调应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在历史关系中被持续建构的过程。他指出,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间接统治”是在殖民与地方酋长、宗教团体、劳工组织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混合性结构,殖民统治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造就了许多“杂合形态”的政治结构。^③库珀强调,非洲历

①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6.

②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1992*, Oxford: Blackwell, 2008, pp. 67 ~95.

③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6 ~47.

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不仅在于发现非洲殖民化前后的多样性的历史发展轨迹,同样重要的是发现非洲人理解这些历史轨迹的多样性的方式。^①

历史社会学不仅提供一种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理解历史因果机制的分析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这有助于揭示制度变迁、国家建构、革命、战争等现象的深层结构。

(二)文化社会学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社会学是研究文化与社会结构互动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强调文化因素如何构成社会运行中的基础变量,并深刻嵌入权力、制度与日常生活之中。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和解释框架被越来越多地引入,以更深入地理解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部的社会运行逻辑、制度、习俗与行为模式。它既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微观分析维度,也使我们得以穿透制度表象,捕捉文化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多偏重宏观政治结构、经济发展路径或历史制度变迁,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往往停留在“背景”层面,而文化社会学的原理、立场与范式恰好能够补充这一不足。文化社会学强调日常生活与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适用于分析那些在跨文化比较中易被忽视的价值差异。

以美国社会学家安奈特·拉鲁的研究为例。她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协作培养”与“自然成长”这两个分析概念,揭示了家庭育儿方式如何随着社会阶层差异而分化,从而影响教育轨迹与社会流动性。^② 她指出,当子女抱怨学校中的权威时,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通常直接教孩子如何“不轻易接受拒绝”,如何向掌握权力者施压,以使对方满足自身需求;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更倾向于要求子女顺从权威。这种差异逐渐转化为文化资本差异,从而结构性地维持社会不平等。此研究为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和社会矛盾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对于理解其他区域或国家的社会分层也有参考价值。

^①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248.

^② Annette Lareau,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1 ~ 3.

此外,文化社会学方法在跨文化的组织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有重要应用。罗纳德·多尔的研究通过对比英日两国工厂制度,发现尽管两国在形式上采纳了相似的工业制度,但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其实际运作逻辑大相径庭。这种显示于工厂运作和工人生活中的差异根源于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① 除非从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嵌入和非机械性的互动入手,否则跨国别/跨区域和跨文化的相互理解将难以实现。

文化社会学通过对社会运行中的文化因素的发掘,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资源。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应主动吸纳文化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推动更具深度与细节的研究。

(三) 社会人类学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人类学是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一个社会或文化必须根据它自身的体系来理解。^② 这意味着,研究出发点不能是普适性的原理或范式,而必须通过亲身参与,使自身融入所研究的社会或文化。于是,人类社会学家对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观察总是“自我观察”性质的;而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或文化总是作为“异域”“异族”“他者”,因为一项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一种不同于“我族”的社会或文化。这种设定要求研究者克服“我族中心主义”,保持对自身文化背景的必要疏离,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而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处于相似的处境: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参与观察而非外部观察的视角;另一方面,研究者不得不在“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保持均衡。

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多偏重粗线条的总体叙事,试图建立对某个区域或文明体的宏观理解,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恰好能够补充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深描”“细读”方面的能力不足。

以布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为例。他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库拉”

^① Ronald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417.

^② T. H. Eriksen, *Small Places, Large Issu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4th ed.),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p. 7.

交换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现,每一种文化都给予其成员一种确定的世界图景,一种特有的生活理念,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丰富和深化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理解我们自身的本性,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需要以敬意和真正的理解把握“他者”的基本视野,从这种视野出发理解其信仰和价值,即使这个他者是“野蛮人”。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习俗、信仰与偏见的茧房。^①

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宝贵的案例。他通过对马来西亚村落的长期田野调查,揭示了农民在压迫结构下的“日常反抗”形式有拖延敷衍、掩饰欺瞒、虚假服从、顺手牵羊、佯装无知、诽谤中伤、纵火破坏、蓄意搞砸等。这种反抗通常是自发的,而且避免直接对抗权威或秩序。^② 斯科特指出,地方权威的经济网络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并不构成压倒性的控制力量,系统性的社会服从持续地被非正式的反抗所侵蚀。^③ 该研究揭示了非体制化的因素形塑基层行为模式的微观机制,为理解马来西亚的社会运行提供了重要帮助。

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至关重要。一方面帮助学者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建立同情的、融入的视角;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揭示制度运行背后的文化机制、隐秘实践和默会知识,为区域国别研究补充重要的微观叙事。

(四) 政治社会学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区域国别研究致力于理解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而政治社会学致力于理解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嵌入性影响。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尤其在国家建构、族群关系、社会运动和政策转型等领域中,政治社会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

以欧内斯特·盖尔纳对欧洲近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史的研究为例。他对欧洲近两百年来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观察。既有研究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原则,进而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基本主张是国

① 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5, p. 407.

②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

③ Ibid., p. 311.

家与民族必然统一。而在盖尔纳看来,二者都是偶然的。他强调,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① 盖尔纳之所以能在两种极端立场之间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是基于对近现代欧洲政治史和观念史的实证研究。在统治方式、生产方式和教育方式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简言之,工业社会的来临要求对民众进行某种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教育,教育方式的变革为特定意识形态的兴起提供土壤,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导致政治形态的革新。对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使得盖尔纳免于陷入咬文嚼字的概念分析和纸上谈兵的史料梳理,也为理解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实证研究基础。此外,这种工作方式对于理解 21 世纪某些区域或国家的政治变迁也有启发。

区域国别研究广泛地涉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认同等领域的讨论,如果脱离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联分析,这些研究将停留在粗线条的空泛议论的水平之上。在政治社会学方法的支持下,区域国别研究获得宝贵的解释力和批判视角。

(五) 计算社会学方法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

21 世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计算社会学的兴起。这一新范式通过计算方法处理海量数据,从中发掘规律,为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动力。区域国别学作为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也在积极吸纳计算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既有对政治现象的量化分析,也有对文化与舆论传播的网络刻画,计算社会学正逐渐成为区域国别学研究创新的重要引擎。同时,计算社会科学的引入也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海量数据和新方法拓宽了研究视野,使学者能够更精准地跟踪区域内政治舆情变化、跨文化互动与信息传播路径;^②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差异导致数据获取难易不均,数据偏差和解释困境也影响研究深度。

^① E.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 ~ 2.

^② 孟天广、郑思尧:《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政治学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117 ~ 130 页。

以社交媒体研究为例。各社交媒体平台在过去十余年产生了海量用户生成内容,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观察公众行为和舆论的新视角。例如,推特作为全球性公开平台,拥有丰富的元数据,学术界对其数据的应用极为广泛。自2010年以来,推特已成为竞选活动中候选人宣传、政党动员以及公众议程讨论的重要工具。在美国,推特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尤为突出。^① 欧洲多国的研究则发现,小党派和在野政治人物往往更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提高能见度,因为相较主流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低成本接触选民的途径。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数据使研究者能够量化分析各国政治精英与公众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关系。多项研究表明,各国政治人物日益重视利用社交平台来发布信息、塑造形象和互动选民,学界则利用社交媒体数据揭示了政治传播的新模式以及社交网络中的舆论极化趋势。

目前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偏重宏观统计比较,依然处于“数据处理”和“信息处理”水平,尚未进入“知识处理”和“知识生产”阶段。未来趋势是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式,在基础层次上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如何在社会学科的发展中充分融合人工智能与人类科学家双方的优长,如何发展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与人类规范充分对齐的科研人工智能并确保人类科学家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前景仍不明朗。在社会学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研究中,都面临着海量的数据处理任务,人工智能在这个领域有巨大优势。然而,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人类科学家,科研人工智能发展的目标导向也不是取代人类科学家。在理想情况下,人工智能将加强和补充人类科学家的能力,而不是成为人类科学家的竞争者。未来的科研主体是擅于获得人工智能支持的人类科学家。

四、传统资源与社会学视角: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从现实背景看,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

^① Andreas Jungherr, "Twitter Use in Election Campaign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Vol. 13, No. 1, 2016, pp. 72 ~ 91.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要求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深刻全面的研究,从而为政府政策与民间交流提供支撑。^① 从理论背景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大国需要,从 20 世纪初至今,英、美、德、日等国家先后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都与其国力提升直接相关。^② 长期以来,主导性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多源于西方经验和方法论,其理论起点、知识逻辑与研究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嵌入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权力格局。这导致以西方社会结构与价值观为参照的区域国别认知方式在全球广泛复制,却难以解释多样文明形态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建构亟需在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叙述的同时,培育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命题、实践逻辑和话语表达。

在中国社会学不断推进本土化、实践化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与中国社会实际深度耦合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语境下,形成了兼具区域适配性与全球对话性的独特模式,可以为发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带来诸多有益启发。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关系性结构和文明共生理念,也为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历史智慧。本节以社会学视角为核心,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理论与实践路径,探讨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路径: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贡献,本土实践的范式突破,传统理论资源对区域话语的重塑潜力。

(一) 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贡献:理论命题、知识贡献与范式创新

中国区域国别学要实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首先需要在全球学术场域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问题意识、方法范式与理论命题。这一过程并非意味着对既有西方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理解其理论假设、语境限制与方法边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发展出能够回应本国社会实际、又具备全球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在社会学视角下,这一范式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维度。

① 江时学:《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拉丁美洲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27 页。

②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 年第 4 期,第 82~87 页。

首先,在理论命题层面,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文化结构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独特的问题视角。相较于西方强调个体主义、契约关系与治理碎片化的分析框架,中国经验更突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协作机制。这一结构性差异引导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命题,例如: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既非对抗又非完全融合的互动机制?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继续发挥组织和协调功能?通过关注这些具有本土生成性的中观问题,中国学者正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西方抽象建模转向嵌入式、结构性和关系性分析路径,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例如侯利文等通过对“找回县域”提出了县域社会工作的研究范畴,主张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纹理和构成上去认识和理解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特色”,以回应新发展阶段下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本土话语权建构和本土知识生产等命题。^①

其次,来自中国本土的社会实践为区域国别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对全球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重构作出了贡献。在扶贫、城市治理、数字管理等领域,中国以国家主导、制度整合和技术驱动为特征的模式,挑战了传统西方的标准治理范式。例如,郑广怀对乡镇社工站推动乡村公共价值生产的研究,提出了“公共性再生产”的理论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工作通过激活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关系伦理”,实现了公共价值从“国家供给”到“社群共创”的转型。^②这一命题与伊西多·瓦利曼对德国“融合课程”与加拿大“定居服务”的比较形成对照:前者因忽视移民社群的文化资本而陷入“规训困境”,后者则通过“社区网络构建”实现了权力关系的重构。^③

再者,范式上的创新还体现在对研究方法的重构。中国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超越与“中国学派”的萌芽。徐盈艳提出的“双重察觉与服务整合”理论,将政策敏锐性(国家治理逻辑)与服

① 侯利文、李欢、何雪松:《县域: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范式构建的新空间》,《学术月刊》2024年第8期,第113~125页。

② 郑广怀:《乡镇社工站推动乡村公共价值合作生产的过程与机制》,《学海》2023年第5期,第132~145页。

③ Isidor Wallimann, “Transnational Social Work: A New Paradigm with Perspectives,” in Carolyn Noble et al., eds., *Global Social Work: Crossing Borders, Blurring Boundarie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5~26.

务敏锐性(服务对象需求)并置,为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在复杂治理环境中的适应性提供了分析框架。^① 这种“双重敏锐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兼具政策解读能力与微观实务技巧,其本质是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超越——既非简单移植西方理论,亦非固守本土经验,而是通过“政策—实践”的双向调适实现知识生产。

(二)本土化实践路径:政策嵌入、在地行动与文化转译

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在于既未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移植”,亦未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本土封闭”,而是通过“关系性治理”实现了国家、市场、社会与文化的多向赋能和实践自觉。因此,从与社会学学科交融互鉴的视角来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它与国家战略、社会政策和基层实践之间的紧密耦合。这种耦合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生成的“制度适配—文化理解—社会介入”的研究路径,其核心在于如何将学术知识嵌入现实场域,并通过在地行动与文化转译建立知识与治理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

首先,政策嵌入路径指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不再停留于学术文本层面,而是主动介入国家治理框架制定、参与政策设计与效果评估。在反贫困领域,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进一步彰显了发展型社会救助的本土化创新,并为全球治理的反贫政策制定提供了新思路。例如广东“双百计划”通过“资产为本”的实践策略,将社会工作从传统的“问题补救”转向“能力建设”。^② 与此类似,在粤北山区,社工团队通过“社区资产地图”绘制、合作社培育等方式,激活了留守群体的自然资本(土地、山林)与社会资本(传统技艺、宗族网络),实现了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发展”的转型。这一实践与莱昂斯提出的“全球—地方联结”视角呼应,^③但更强调“制度—文化”的双重适配性:在制度层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与驻村社工制度保障资源投入;在文化层面,通过尊重乡土逻辑(如宗族互助传统)提升服务接受度。

① 徐盈艳:《双重察觉与服务整合:社工站建设与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第 44~54 页。

② 张和清、廖其能、李炯标:《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广东社工“双百”为例》,《社会建设》2021 年第 2 期,第 3~34 页。

③ Karen Lyon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mplic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36, No. 3, 2006, pp. 365~380.

其次,在地行动强调区域国别研究需摆脱“文本型”知识生产,识别宏观政策在微观社会中的转化路径,进而提出具有在地逻辑的制度调整建议。中国社会工作区域(国别)研究的首要特征在于其“国家—社会”协同治理框架下的实践嵌入性。陈涛与蒋斌提出的社工站制度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体现。^① 社工站作为“政策执行终端”与“专业服务枢纽”的双重定位,既承接了政府兜底民生保障的职能,又通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实现服务精细化。例如,李红云与徐其龙构建的“三位一体”乡镇社工站发展路径(服务供给、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将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孵化与本土人才培养整合为有机系统,既解决了贫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又通过“驻村社工”制度实现了服务与治理的在地化融合。^② 这种模式突破了西方社会工作“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传统框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国家主导下的专业自主性发展”新路径。

再次,文化转译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多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在当前全球移民频繁、文化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将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社会习惯、制度逻辑有效地“翻译”成为可以沟通的知识结构,是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此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为全球社会正义议题提供了“结构—文化”双重解构的视角。兰剑和慈勤英对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的研究揭示,中国社会工作通过“结构干预”(如产业扶贫政策倡导)与“文化干预”(如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结合,回应了“伦理霸权”问题。^③ 这种实践与非洲国家将社区会议融入社会工作干预的案例形成跨区域对话,共同指向“全球社会工作伦理”的建构可能性——即通过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普适性价值(如社会正义)与地方性知识的共生。

(三) 中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对于区域国别话语构建的启示

在构建具有文化根基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理论不

① 陈涛、蒋斌:《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11页。

② 李红云、徐其龙:《乡村振兴下乡镇社工站“三位一体”路径的探究——以广西X自治县社工站为例》,《社会福利(理论版)》2022年第2期,第38~43页。

③ 兰剑、慈勤英:《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63~68页。

仅是“被研究”的对象,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话语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理论,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特征,并期望中华文明在人类社会新的历史进程中有新的贡献:“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①这一思想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第一,在国家与文明关系的理解上,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权—边界”模式的治理逻辑。中国传统上并不以领土对抗和排他性主权为核心,而是以“天下”观、关系治理等形式构建一种文化主导、包容有序的区域秩序,强调中心与周边的互动与整合而非征服,体现了一种非殖民性的区域治理智慧。例如,秦亚青通过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关系”概念,超越西方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框架,提出以信任与共识为基础的“关系治理”模式,用以解释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如何形成过程主导、互惠共赢的新型地区秩序。^②

第二,从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出发,中国传统社会理论强调“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文化观,对推动全球文明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不仅是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底色”,也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理解中国社会独特性、推进文明互鉴的钥匙。一方面,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核心正在于不同民族文化因“和而不同”而又能够“多元互补”,^③这种文化观能够为克服不同文明群体之间因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歧异而发生冲突提供解决路径,^④同时也能为世界范围内新秩序的建立与文化融合提供思路。^⑤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异质文化之

①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②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页。

④ 费孝通:《对“美好社会”的思考》,《费孝通全集》(第14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47页。

⑤ 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费孝通全集》(第17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552页。

间的互动并非对立排斥,而是充满互补与协同的历史实践。如吴义雄回顾了19世纪前期中西精神文明交流如何为物质文明交流所驱动的历史,指出二者的相互影响塑造了中西关系的整体面貌,从最初的物质交流,扩展到更广的层次,塑造了不同区域人民的生活形态。^①

第三,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推动“中国故事”与“中国传统”在理解异质文化上的解释力。例如,黄剑波、赵亚川等学者主张,汉语人类学亟待在理论自觉层面进行系统整理和提炼,以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为依据,以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经验与思想资源为源泉,通过汉语写作,基于汉语独特思想资源,实现对全球多样文化的深刻描述和面向人类现实经验的广泛对话。^②梁永佳则认为,应当尝试“以中释外”,通过文明互鉴超越“中国特殊论”,探索中国思想的普遍性,用华夏视角对无限复杂的域外世界进行文化翻译,在具体经验研究中通过对话与欧美论述形成互补,从而建构能以理服人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③

五、结 语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的交叉学科,正面临知识结构重塑与范式革新的双重挑战。本文从社会学理论、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学方法、文化传统等维度系统梳理了区域国别学与社会学的深度融合路径,旨在探索社会学如何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论创新,并进一步支持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在此基础上,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置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高度,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学术格局的重大转变。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化,意味着跳脱以西方文明、西方范式与西方经验为出发点的基础框架,转而从中国自身的文明经验、社会结构与文化逻辑出发构建新的底层结构。自冷战时期以来,西方区域国别学多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

① 吴义雄:《贸易扩展与19世纪前期中西文化交流》,《世界历史》2024年第6期,第1~7页。

② 黄剑波、赵亚川:《汉语人类学的历史、实践与可能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第99~122页。

③ 梁永佳:《以中释外:基于文明互鉴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0页。

态输出为核心目的,其知识生产难以摆脱“他者化”与“工具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根本目的在于构建“共生互鉴”的全球文明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因此,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应强调“文化理解”而非“文化规训”,以“参与观察”超越“我族中心主义”,在去殖民化知识框架中重塑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文明传统与中国现实关切,将区域国别研究与本国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资源深度融合。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反映了中国学人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努力方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这种“自觉”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具有独特价值,拒绝将西方现代性作为普世范式;二是基于中国社会经验提出解释世界的理论命题;三是发展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研究方法。

再次,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建构,还需在“以中释外”的基础上推进到“中外互释”“共生互补”。中国学者应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审视世界问题,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构建理论基底,反向启发国际理论体系的扩展与重构。这种“知彼”与“自知”的双向互动,是提升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国际话语权的核⻖路径。

最后,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与方法论挑战。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不仅拓宽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证广度,也推动了研究范式的重构。中国在数字治理、网络舆论、平台经济等领域的实践经验,已成为全球观察的重要对象。如何将这些经验整合入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中,并在研究主体层次上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科学家融合互补,将是未来区域国别学中国化的战略重点。

总之,区域国别学的中国化,不只是学术地理的本土化,更是方法论的重构、价值观的更新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社会学作为连接理论、经验与实践的重要支点,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不断深化社会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不仅可以拓展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疆界,更有望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